

某些基层干部 形式主义的几种表现

一是以喜藏忧,阻碍着对实情的把握。正确地估量客观形势,是我们党制定路线、方针、政策的基础。而有的同志在向上汇报时,讲成绩“成龙配套,有楞有角”,讲问题“遮遮盖盖,边边角角”;甚至以为讲问题是“揭短、亮丑”,在领导面前出“洋相”、“不光彩”。事实上,有些领导同志也总是喜欢听好的,尤其对他分管的那份工作。然而,十全十美的事,在世界上并不存在。有些坚持科学态度的乡村干部,就向我们讲了事物的另一方面:“我们的产量、产值、效益以及群众收入是有一定水分的”。为何呢?“如不掺点水分,就显不出一年一大步,就拿不到奖励,还要承受无形压力”。

二是以造声势取代实干,助长了惰性。有的地方似乎觉得“声势造得越大,越能说明决心大、成绩大”,因而每当一件事情到来,声势造得“震天响”,而又不在于落实上下苦功。结果是:调门很高实干差,经济建设难迈步。我们认为,用表面上的轰轰烈烈掩盖实际行动的冷冷清清,是非常不可取的。

三是以疲于应付耗费精力,劳民伤财。不少乡村干部反映,现在需要我们应付的大小会议,各种检查评比、达标竞赛、考核验收、参观访问,以及“杂七杂八”的统计报表太多,弄得咱“六神无主,只能糊糊而已”。有的乡镇干部说,他们天天“浸泡”在接待、陪客之中,有时一天需接待两、三班人马。这既费力又耗财,怎能抓得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?!

四是以强求一律冲击实事求是,造成决策失误。所谓强求一律,就是上级对下级只下达“刚性”指示,而不区别对待;下级对上级的指示只是照搬照套,而不顾本地实际。比如,有的乡是沙土地,保水性能不好,又无配套水利设施,不适宜种稻,而为了执行上级指示,却硬性强制农户“早改水”,结果是既加大农本又减少产量,使农户吞下“苦果”。在兴办乡村企业上也有这种情况。对某种效益好的项目或提倡兴办的某类企业,就一轰而起,争着上,由此造成了重复建设的损失。

(摘自《真理的追求》1993年第2期 周书益 曹思琪的文章)

怎样建立科学、规范、 灵活的财政体制?

科学、规范、灵活的财政体制,是建立高效的财政宏观调控体系的基本条件。目前,中央与地方财政体制变动频繁,挫伤了地方政府执行财政体制的积极性和信心,也使财政宏观调控难度增大。

怎样建立科学、规范、灵活的财政体制?我们认为,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,规范化的财政体制应该由两个部分组成,即基本财政体制加特殊政策。所谓基本财政体制,即财政体制的确定,完全依据现实的经济发展和财政收支状况,不受国家某一时期政治、经济形势以及经济发展战略的影响。基本财政体制必须体现公平原则,同一经济发展类型地区,省与省、市与市、区与区体制必须具有可比性。所谓特殊政策,即国家根据政治安定、经济发展战略的需要,为加快某些

地区发展而给予的特殊优惠政策,如资金政策、投资政策等。要改变目前把财政体制与优惠政策混在一起的作法。这种作法弊大利小,使各省、区、市之间的财政、经济失去了可比性,失去了平等竞争的环境,加深了中央与地方、地方与地方之间的矛盾,使财政宏观调控困难重重。

基本财政体制应尽量保持稳定,因政治、经济发展需要进行调整,应与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同步。除国家因特殊情况,需要全面调整各级政府分配关系外,一般调整应避免出现大的震动。特殊政策则不同,国家根据政治经济发展需要,可以随时进行某些调整,取消优惠或者给予优惠,这就增强了财政宏观调控的灵敏度和灵活性。

(摘自《湖北财政研究》1993年第1期 张安胜 邬守国的文章)

有偿服务和无私奉献 并不就是对立的

《瞭望》杂志1993年第9期的评论员文章说,有偿服务和无私奉献并不就是矛盾、对立的。付出一定的劳动,取得相应的合理的报酬,这是一回事;讲奉献,自觉维护社会公益、公德,这是另一回事,是社会主义社会人们的义务,高尚的文明的道德风尚。救人急难,勇斗歹徒,为维护公众利益挺身而出,以至献出生命,这是社会主义英雄行为,是不能以金钱来估量的。见义勇为,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,这义,就是国家的、社会的、人民的利益。雷锋是这样做的,现在还有千千万万的人在这样做。

(边吉摘)